

第一 部 分

第一章

引論

強而有力及闡釋清晰的敘事可以連繫過去與未來。這些敘事更可令公眾產生信任，並採取行動。一個良好的敘事甚至可說服其他人相信某些人或某些事，即使對於所發生的事情沒有直接的利害關係，都是特殊的，而他們也會堅定不移地希望那些直接牽涉其中之人可以順利實現所想。

1997年以前，英國譜寫了一段關於香港的美好敘事。生活在殖民地時代的香港人，勇敢堅毅，辛勤勞作；鑒於曾被英國以西方模式的威權法治統治，香港人在其仁慈治理之下受循循善誘，故即使有朝一日被自由欠奉的中國統治，他們仍然可以創造巨大成就。香港人都是世界主義者，他們可以隨心所欲，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尤其是在受普通法法律制度所保護的資本主義體制下，盡可能創造更多財富。

中華人民共和國也有書寫其關於香港的敘事。在19世紀，英國從貧弱的中國攫取這片土地，而1997年香港回歸祖國標誌着這段漫長而又屈辱歷史的終結。香港在中國將會享有非常特殊的地位；而在中國明智和務實的「一國兩制」政策之下，香港將能如過往般保持政治穩定與經濟繁榮。

英國的觀點也是彼時國際傳媒聚焦之處。大多傳媒相信香港與香港人具備在1997年以後繼續維持成功的因素與條件。中國正在踏上現代化的道路，伴隨迅速的經濟增長，中國將會變得

更為「資本主義化」。經濟改革會促進民主轉型，令中國可以順理成章走上「自由民主化」的道路。這也是一直謀求中國加入他們全球陣營的西方列強所期待的。然而，1989年的天安門事件是一個轉捩點——象徵自由民主體制最終會取得勝利。從長遠來看，只有中國成為自由民主的國家之後，香港才能更好地維持自由，充分實現其渴望的民主制度。

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後毛澤東時代開始至今已逾40年，而香港回歸亦已經21年，英國版本的香港敘事已不再適用。香港人對自己已經信心不大，而且他們的未來也似乎愈發不明朗。其他人似乎也覺得香港正在日漸失去其魅力。殖民時代的香港之所以能夠吸引他人注意，是因為她是時代的產物——其存在本身就是一種優勢。一旦再次成為中國的一部分，若香港能挑戰北京當局的權威，她仍會備受矚目，尤其是西方國家。如果她沒有引發政治紛擾，則會變得暗淡無光。與此同時，中國——尤其是隨着其迅速崛起，仍會讓西方國家回想起其「黃禍」(yellow peril) 形象。

在西方人的意識中，他們希望看到一個頑強獨立的香港，「勇敢地面對」專制的北京政府，就如《聖經》故事裏少年大衛(David)以弱勝強，打敗了巨人歌利亞(Goliath)一樣。然而，這應該不是香港樂見的結果。香港將會輸，而且沒有人會在乎。19世紀的英國首相巴麥尊(Lord Palmerston)曾說過在地緣政治中，沒有永遠的朋友，也沒有永遠的敵人，只有永遠的利益。此名言現在仍然適用，也就是說香港不應與中央政府為敵。

香港必須創造一個嶄新敘事，以激勵人心，繼續前行。這個城市和其民眾現在正身陷囹圄。他們缺乏一個引人入勝的敘事，以連繫過去與未來。英國版本的香港敘事已成為歷史；北京版本的敘事亦是以一種精神創傷遺產的方式加以講述的。在此等情況下，只有香港才能創造屬於自己的敘事，以理解過去、闡釋現在，並勾劃出一個可信、鼓舞人心且能夠引發廣泛關注的未來。

一個好的故事會成為反覆講述的敘事，不僅可以獲得各方積極的支援和鼓勵，還能夠引發具建設性的回饋，並從中獲益。只有香港了解自己所經歷的考驗與磨難，才能令其民眾和其他人理解這個故事主角走過的驚人旅程。這應該是一個備受世界矚目的敘事，將這個地方、這裏的人民、他們的經驗與文化，以及制度的獨特性編寫在其中。這個敘事的設定不應是「資本主義好」與「社會主義劣」這一簡化的背景，而是應該以全球地緣政治變化為背景：中國是一個正在崛起的大國，而西方列強則在對她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建立起來的全球政治經濟架構提出質疑。

第二章

英國殖民地香港的傳統敘事

香港創造了世界上其中一個最成功的社會。
查里斯王子 (Prince Charles)

眾所周知，休斯 (Richard Hughes) 曾在1968年出版的著作中，形容香港是一個「借來的地方」，過着「借來的時間」¹。此書的書名帶出了重要的信息，就是英國殖民地時代的香港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地緣政治的一個反常現象：一個歷史遺留下來的殖民地前哨，終有一天可能會不復存在。

鴉片戰爭後，清政府割讓香港島和九龍半島給英國。隨後，新界亦以九十九年期租借予英國。雖然殖民主義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不再流行，許多前殖民地紛紛獨立，但中國在1972年明確表示這不會是香港的命運。香港的問題將會「在條件成熟之時通過和平談判方式解決」。

殖民地香港是一個「東西方文化交融」，而且非常有趣的地方：一個靠近「紅色中國」的自由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城市裏，「西方」的影響無處不在，物質主義的追求佔據了城市生活的很大一部分。至1970年代，香港一直是西方留存在遠東地區重要

1. 這大概是關於香港最有名的一句Slogan：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它起源於1968年，長駐在東亞與香港的澳洲籍記者休斯 (Richard Hughes) 描寫香港的一本書。在書中，他坦承，這句被用來做書名的原話，出自著名作家、比利時與中國混血的韓素音。她1959年在《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 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擠於強敵狗咬狗骨之爭鬥中，只有寸土之香港竟能與之共存，原因令人困惑費解，但香港成功了，就在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

的前哨基地。基於香港與英國的關係，她成為西方的一個重要渠道，以監聽在毛澤東時期對外封閉的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的多姿多彩與共產主義中國的陰鬱單調形成鮮明對比。在這個面積約1,100平方公里的英屬領地上，財富迅速增長；相反，毗鄰的中國內地則出現大規模的貧困。香港是一個在溫和而高效的英國政府統治之下經濟取得成功的華人社會，民眾亦在普通法制度下享受着英國式的自由。對世界上其他國家來說，香港是從事商業活動的絕佳地方。據稱，香港人本來就不太關心政治，他們都忙着賺錢。事實上，香港並非完全非政治性。這裏存在大量本土政治問題，殖民地政府需要處理英國在香港的商業利益，以及中國人的商業利益。港英政府必須通過任命社會領袖為政府委員會（包括本地立法機關）成員，來獲取他們的支持，並向其頒授英女皇的榮譽勳銜予以肯定。

英國人知道他們必須思考香港的前途。時光飛逝，新界的租約於1997年6月30日屆滿。1979年，時任港督麥理浩（Murray MacLehose）訪問北京，拜見了當時中國的最高領導人鄧小平，並提出有關延續和修訂新界租約的問題。據說，這次會面引起北京當局對香港未來的審慎討論，並促使其最終決定收回香港主權。

經過幾輪談判後，中英兩國達成協議，於1984年簽訂《中英聯合聲明》。該協議定明在新界租約期滿後，中國將收回整個香港地區，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中國承諾實施「一國兩制」政策，賦予香港在日常事務中享有「高度自治權」。《中英聯合聲明》被形容為當時存在的最佳交易方案。英國希望獲得世界輿論的支持，而英國政府的表述是她已經盡其所能為香港獲取一份1997年之後穩固持久的協議，並竭力為香港平穩過渡作好準備。此外，這項協定亦提到選舉的事情。當時由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領導的英國政府認為，為了獲得議會對其與中國簽訂協定的支持，聚焦這一點頗為必要。

這個關鍵時期的香港敘事指出，這顆寶石——在過去150年間經英國精心製作，並得益於勤勉的本土居民的幫助——正交還中國這個實行共產主義、經濟相對落後的國家手中。1984年，中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僅不足香港的5%。憑藉其公認的非政治性、民眾的努力及英國高效率管治的巧妙結合，香港在國際間的地位堪比其他國家。

在香港，民眾對回歸所引起的爭議能否真正解決感到擔憂，這是可以理解的。許多人都對實行共產主義的中國抱負面印象，因為他們曾在1949年之後的不同時期逃離內地，前往殖民地香港避難。尤其是在1989年天安門事件之後，成千上萬人——大部分是有經濟實力和職業技能的人，移居國外。他們主要遷移到接受移民的傳統英語國家，例如澳洲、加拿大和美國等。

香港的敘事實際上是「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民主與威權主義」、「自由與控制」之間更大地緣政治衝突的完美體現。儘管殖民主義已經過時，但從西方的角度來看，英國是「溫和的」統治者，而中國則是「獨裁的」，不受歡迎的共產主義體制是「專制的」。當時，資本主義與自由民主的結合被認為是經濟和地緣政治成功的最理想模式。

香港人必須確信事情可以妥善解決，而「一國兩制」則是唯一可以解決問題的方法，因為中國承諾香港可以繼續維持在英國統治時期的制度和生活方式。事實上，中國領導人並沒有忽視香港在社會經濟方面比內地更為先進的事實，使「第二個體制」在「一個國家」之中存在便是一個務實的解決方案，以贏得香港的民心。中國領導人必須令1997年回歸後的香港取得成功，才能表明他們能做得和英國一樣好。彼時，國際社會雖對香港充滿希望，但內心仍抱有懷疑的態度。畢竟，1980年代的中國才剛剛開始現代化的進程，並不能保證她的努力會取得成功。多年來，隨着向中國統治過渡的不斷推進，香港贏得了世界的矚目。

香港的殖民地背景

西方國家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經驗主要來自其建構西方帝國的經驗。19世紀時帝國主義的興盛，也助長了那些工業強國在世界廣泛地區進行殖民擴張，從而擴展領土，獲取新的自然資源。英國是一個最成功的殖民者之一。她在世界各地攫取了許多殖民地，包括香港，並統治了這些地方很長的一段時間。

英國對中國最南端的土地頗感興趣，希望以此為據點發展貿易。在1842年訂立的《南京條約》第3條明確規定將香港島割讓給英國，以便英國商人「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在香港建立管理機構，也是為了促進英國的商業活動。為提升商業效率，殖民者將英語設為官方語言，建造新的實體基礎設施，建立英國人所熟悉的法律體系，創製警務系統以執行其殖民統治，允許「自由」的英文媒體能夠報導商業資訊，並推行一套管理殖民地事務的文官制度。大部分行政工作都是由接受過英語教育的本地人完成，但政策制定則由英國官員負責。隨着殖民者的到來，基督教傳教士開始設立學校來教育和改變當地人的信仰，同時也開始教授英語，以便當地人能夠為殖民事業效力，並促助其發展。

許多的殖民地都為英國財富和權力的增長作出貢獻，但管理成本卻十分高昂。最好的情況當然是管理殖民地的同時，不會對英國財政部造成負擔。殖民地的管理應當是自給自足的。就香港而言，英國別出心裁地創建了一套出色的土地收入制度，與徵收土地稅十分類似，但事實證明它比傳統的土地稅更為有效，收入更高。

早期的殖民者宣稱所有的土地都屬於皇室所有，只能以批租的形式出售。香港只有兩處地方是例外的：聖約翰座堂所在的土地，以及曾經由一家英國貿易公司經營、位於北角的前太古船塢。除這些例子外，所有土地都是在支付了巨額的預付地價後，

以長期批租的方式授予的。隨着殖民地經濟的快速增長，提出改變土地用途的申請迅速湧現。為了確保每一項變更都獲批，還須預先繳付更多費用。這個安排確保政府能夠獲得可觀的經常性收入（從大約1880年開始，政府收入最終因徵收大量鴉片稅而迅速增加）。這種與土地有關的收入制度蓬勃發展，至今仍再在運行，繼續是香港簡單、低稅率和傳統財政收入制度的一大支柱。

華人精英——其中很多是英國人的貿易夥伴——被期望能夠為整個香港社會的貧窮人口提供幫助。於是，一眾富有的精英成立了多個慈善機構，如東華三院等，為華人提供服務。在大部分殖民地時期，英國人與華人的社交生活一直是分開的，只有一小部分西方化的華人精英會與英國人交往。

殖民主義從來不會是一個公平與公正的體制。當地人被征服，而殖民者總是擔心潛在的民族主義傾向。香港也並無不同。在中國，清朝的滅亡造成政治真空。民國時期（1912–1949）是一個政治不穩定的時期。在此期間，中國共產黨於1921年成立，同時亦發生了兩次世界大戰。1949年，中國共產黨在國共內戰取得勝利，起初為建立新中國帶來希望。輸掉戰爭的一方——國民黨，移居台灣。雙方繼續在國際舞台上展開鬥爭。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取代了（在台灣）的中華民國。貫穿整段歷史時期，英國確保香港不能被中國和台灣任何一方用作鬥爭舞台。英國擁有嚴格的國家安全法，以阻止騷亂萌芽。

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取得中國政權後，也同意讓英國繼續管治香港。儘管如此，在文化大革命時期，暴力衝突還是於1967年蔓延至香港。這場騷亂徹底重挫香港。在1949年共產黨執政後離開內地的許多當地人，更喜歡英國人——有着良好記錄的「惡魔」，而不是共產黨人，因為共產黨人在1950年代推行了農業集體化，並對所謂的「右派」加以嚴懲。從那時起至1970年代，「紅色中國」一直都是予人貧窮、落後和專制的印象。